

1932-1949

民国西农纪事

回顾了西农在民国时期的办学历史、学校初创时期的办学成就及办学精神，
阐明了这个历史阶段在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重大意义，
归纳出了民国时期西农精神对今天办学的主要启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 编

民国西农纪事

回顾了西农在民国时期的办学历史、学校初创时期的办学成就及办学精神，
阐明了这个历史阶段在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重大意义，
归纳出了民国时期西农精神对今天办学的主要启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 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西农纪事 (1932—1949)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编.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83-0047-6

I. ①民… II. ①西… III. 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史—民国 IV. ①S-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162 号

民国西农纪事 (1932—194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 712100
电 话	总编室: 029—87093105	发行部: 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47 千字	

ISBN 978-7-5683-0047-6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编委会

主 编：王文慧

副主编：杨 恒 曹德奎 安聪娥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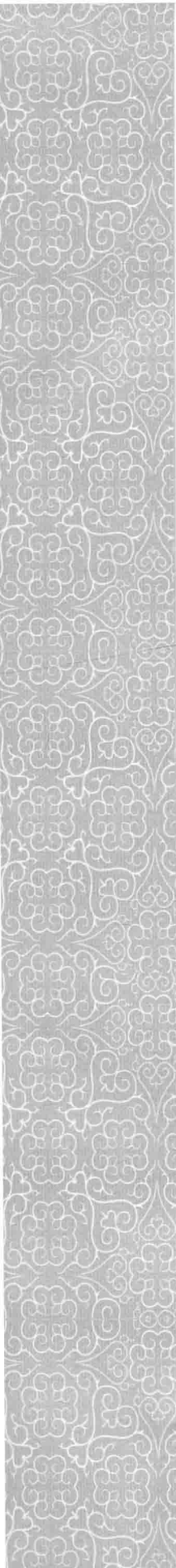
《民国西农纪事》是一册依据档案史料记述补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民国时期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到国立西北农学院时期有关重要事件的资料汇集。

西农在中华民国时期虽然只有 17 年，但其在整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0 年历史进程中，有着奠基性、开创性的意义。

民国时期西农史料丰富，但随时移世易，加之历史等原因，档案分散，缺失亦多，在以前已有的校史记述中亦有缺漏或不详而难以准确完整。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曾经封存的历史档案也逐步开放。为完善民国西农历史记述，还原历史本貌，在学校的关注及支持下，校档案馆近几年从上级档案部门收补了民国时期西农的大量史料，同时又参阅了历史上与西农有关联的一些院校的史料，藉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本着坚持客观真实、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又依据档案史料编成《民国西农纪事》供师生及社会有关方面参阅。

从《民国西农纪事》中那些已为人知或尚不为人知的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出，学校源远流长的历史，高规格创办的宏大规模；“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的奠基铭所确立的民主、科学、德育智育并重的办学理念及“诚朴勇毅”校训对



学校发展与优良校风学风形成所起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名师云集、大师办学、理论与实践并重、坚持科研创新的传统，以及师生员工中那些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投身西北，献身终生或投笔从戎、舍身疆场的种种豪迈之举彰显出的爱国、包容、创新的博大精神。

当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的“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的讲话精神，结合学校实践，以史为鉴，继承和弘扬学校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以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目标为契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不断谱写中国梦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篇章。

目 录

前言

一、西北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端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创建/001

二、百代宏图奠胜基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址择定与奠基 /013

三、在包容中扩大与发展的西北农专 /032

四、国立西北农学院合并组建

——北平大学农学院落泊武功及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并入 /048

五、名师云集张家岗 /059

六、开创优良校风的校训校歌 /093

七、“武功军事会议”在西农召开 /100

八、西农抗战老兵今安在

——抗战期间西农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09

九、抗战烽火中巍然屹立的教学大楼 /142

十、峥嵘岁月中爱国民主进步 /148

十一、民国时期西农宝贵的办学成就 /154

附录：民国西农大事记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期（1932.4—1939.4） /166

国立西北农学院时期（1939.4—1949.5） /173

后记 /178

一、西北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端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创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危难中，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兴学兴农的呼吁中，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区域——陕西武功创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之前身）是近代在我国西北地区独立建校最早、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高等农业学府。

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概况

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始于清代末期。自 1902 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始将农业学堂作为实业学堂之一种列入正轨学制系统。以后，各省相继设立高等、中等、初等农业学堂，不少师范学校和普通高等、中等学校也纷纷开设农科或农业课程，如南通民立师范学校农科（1906）、京师大学堂农科（1910）、清华学校的农业课程（1911）等。西北地区有甘肃农林学堂（1907）、陕西省会农业学堂（1909）等。截止到 1909 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 5 所，中等农业学堂 31 所，初等农业学堂 59 所，在校学生数分别为 530 人、3 226 人和 2 272 人。辛亥革命后，不久就



1905 年，京师大学堂设农科，图为农科大学校门

陷入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高等教育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到1927年前后，全国有农科大学8所，农林专科学校14所。在农科大学中，国立的3所（北平农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农科、广州中山大学农科），省立的2所（河北大学农科、山东大学农科）、私立的1所（南通大学农科），教会办的2所（金陵大学农科、岭南大学农科）。农林专科学校在1922年的时候有8所。由于北京、河北、山东、广东4校相继改为大学农科，到1927年，农林专科学校只剩下山西、河南、四川、江西4校。到1931年，全国高等农业学校发展到17所之多，而唯独西北地区竟无1所。（《西北高等农林教育史》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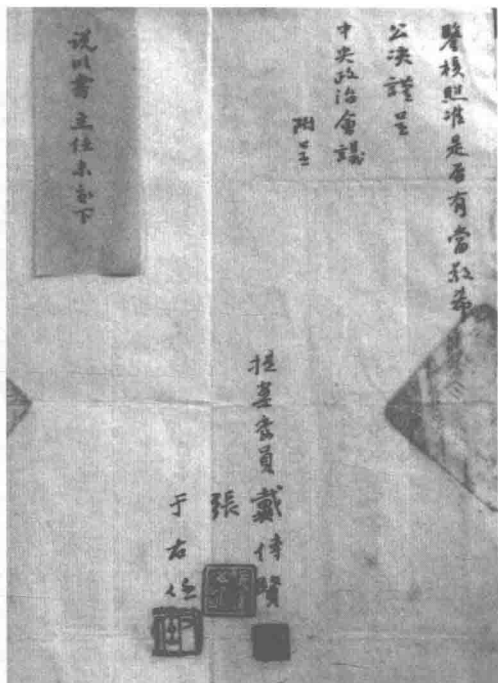
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呼吁中，《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案的提出

建设西北，开发西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期，国家政治动乱，经济凋蔽，民不聊生。1931年“九一八”抗战起，东北三省沦丧，与此同时，西北特别是陕甘两省发生了五年连续大旱，疫病流行，关中一带死亡达300万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的呼吁。当时，不少人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纷纷呼吁开发边疆，把西北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关注西北的社会人士纷纷成立团体，全国有37家之多，如开发西北协会、中国边疆协会、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西北问题研究会、新西北社，等等。一批关注西北的刊物，如《开发西北》、《西北研究》、《新西北》、《西北问题》等相继创刊出版。各种资源、实业、水利、交通、教育考察团纷纷到西北去考察，并提出了“兴学兴农”的主张。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3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教育部，拟具各省市普设农、工、医三种专业学校的实施方案。实业部会同教育、内政二部通令各省市遵办农业推广机关。经实业部拟定，第一年中央补助各省经费22万元，呈请中央指定庚款余额之利息及关税项下拨补（《农村新报》第8年4号）。不久，全国高等农业学校发展到17所之多，而西北地区竟无1所。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受到了震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当时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以洛阳为行都。同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以期引起国人对西北建设的关注。



《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步计划》提案委员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案书（1932.10）

建設西北專門教育之初期計劃

西北文化經濟之發展，關係於國家存亡，不俟論列。發展西北之切實計劃，自有其多端，而交通之建設，與軍政民政之整理，尤為當務之急。此政府急應盡其最善之努力，根據總理之主張，與地方之實況，以從事於政策之推行者也。惟建國以教學為先，施政以得人為本。現在即當借專門教育之建設，為國家培植人才，以作一切改良與創造事業之原動力也。就西北教育之現況論，人人均感其可危，然而可危者，決不止西北，全國各處皆然。且西北今日所發現之思想不良，紀綱不振，管教者不得其法，不得其人，諸般皆為由他處傳染而來之惡影響，並非西北之所獨有。特以西北之人，性情魯直，而文化又較低於沿江沿海，故所表現者，更足令人注意而已。就現狀論之：陝甘各地，連年因天災人禍之故，人口

已大減。此種天災人禍之原因，半由於外國勢力之壓迫，半由於過去三十年間全國教育學術上之錯誤。蓋西北之天災，大半由人為之錯誤而起。然以教育論過去之錯誤，其質與量，均未若有今日之甚。今日教育上國內所受之不良的影響，強半由於三十年來之留學生。現在則由小錯而鑄成之大錯，已遍於中國。若不急起而為之救濟，十年二十年後，中國之人口，尚不知低減至如何程度，其危險真非可以語言文字述者。但就更一方面言之：西北今日高等教育，直可云尚未開始，故他處大學專門學校之錯誤與惡劣環境，此間尚未造成。中學思想方法等等錯誤，尚有可以救濟之道，而程度之不及者，更不難於提高。只要今後新建設之專門教育，不再錯誤，其教育與學術兩方面，均得其宜，則他日或能造成一至良好至確實之學風，以反而救濟全國，亦未可知。蓋已成之害難改，而未成之害易防也。

戴傳賢等起草的《建設西北專門教育之初期計劃》

（參見戴季陶：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南京，1934）

建設西北之專門教育，其最要之點有二。

一、造成發展西北經濟事業所必須之各級專門人才；

二、令現在各中學生有確實而正當之生活出路。

此兩點實為一個問題。就第一點言，舍現在之中學生，無從另覓專門人才之基礎。就第二點言，只有將現在之中學生，造成第一種人才，乃為確實而正當之出路。總理云：恢復固有的道德智能，與趕上世界最新的科學文化，為救國救種之要道。第一事應求之於教育之方針與方法；第二事應求之於學術。且兩者亦常有互相因果之關係，果真能趕上世界最新之科學文化，則固有之道德智能，亦必已經恢復。蓋無禮無義之人，雖至細微之事，尚不能成，遑言切實之學問。故今後任何一種教育，其實際之訓育，必須造成一知禮知義之人，方可在家成為克家之子弟，在社會成為有用之人才，在國家成為忠實之人民，方能擔當

救國救民之革命事業，而真實之生產技能，生活本領，實為修齊治平之基礎。過去十年間之一切教育，不從此着手，而徒以空洞之思想，刺激青年之欲望，使青年之欲望增高，能力降下，於是害人害己之事，乃層出不窮。今後矯正此弊，惟有從實際上增高青年之能力，同時教之以禮義，使各人能自克，則總理所指示吾人之兩大方針，與上述建設西北教育之二要點，均同時解決矣。

此實際之計劃，約言之：今後西北新興之大學，應以理科為中心，而農林礦工醫各實科，為之血脈四支。至農林諸科之經營，則又須以農場林場等實際事業為根據。蓋致用之學，必從實行而得豐富之經驗，與堅實之能力。外國學術事業，兩俱發達；在學生之實習，畢業生之致用，皆有極進步之事業以應之。中國則學問事業，兩者均極幼稚。若各實科不兼營相當事業，不獨對於前舉兩事，深感困難，即教授亦因研究之對象缺乏，而事事落空，終致所教所學，俱不切實際。且

學校之所教者為學生，而事業之所教者為社會。若融合學問事業為一而表現之，為一般人民經營事業之所取法，其利益之大，更難枚舉也。

茲將最簡略之規畫，分別述之，其詳則待專家根據各種實況重行起草。

第一、先辦國立農林專科學校。

附屬事業

農場及林場牧場之面積，大約應如下述。

一、高平原 二千畝至一萬畝

二、低平原 一萬畝至五萬畝

三、岡陵地及山林地 一萬畝至五萬畝

上述經營地之面積，在陝西荒地極多，求之不難，惟今後經營之法，必須以經濟為前提。蓋最有效之農林推廣教育，始於最合理最有利益之經營成績也。過

去各地試驗場等之經營，往往有遠不如民間，而每年浪費公家之經費者。農學之不為人民所重視，此一大原因也。

天文氣象台 設於西安，若能設西安蘭州兩台尤佳。將來理科興辦後，可劃歸天文數學系管理也。

國營黃河造林局 此案早經中央通過，尚未見之實行。其目的在培植黃洛渭及上游黃河各支流發源經過地之森林，照過去種種情況觀察之，當此人才經濟兩俱缺乏之時，此局在初期舉辦時，必須以學校為根據，然後不致徒擁虛名，浪費國帑，而無實際。故初辦之數年間，宜以本校之林場主任兼局長，將教育學術與宣傳推廣，合而為一。俟規模既具，幹部人才已得，經營成績已多時，再將此局劃出，直接歸政府主管機關之監督，而專理森林行政事宜。其時即可選名曰森林局，而不必僅限於造林矣。此事條理至極簡單，實在粵，亦有相當之

戴傳賢等起草的《建設西北專門教育之初期計劃》

(參見戴季陶：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南京，1934)



與司國民教育專門教育者，均切實奉行之。

五、外國文要加緊訓練，本科生必須能自由讀書聽講。若此層不能辦到，則無從言高等專門教育，教者學者均宜知之。

六、國文一科，預科固宜十分認真教習，而本科亦不宜輕置。無論何種學科，若學生無自由讀中國書，研究中國固有之學問，以及中國文自由發表其學識之能力，不獨不能造就專門之學問，亦不能應用於中國之社會也。

七、體育之獎勵，特為必要。其利益不僅在於強健身體，而尤足以養成自愛與合羣之學風。球類之運動，尤為有益，不可忘也。

六、七兩項，修正中山大學規程至有可採，宜注意之。

八、制定規程時，宜根據本計劃之精神，制定一理科中心之西北大學規程，

而另定一實施方案。各種設備之綱目程序及預算，皆列於實施方案中。九、本校之建設，應由中央劃定，庚款若干為設備費，若干為經常費，如實施方案所需之數。西北之開發，關於中國之存亡，國家固不宜置之不顧，而掌理庚款者，亦不宜置之不顧也。按此案於二十一年五月在長安所作。十月間提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三二七次會議，決議原則通過。推傅賢于右任、張繼、朱家驊、王陸一、焦易堂、沈鵬飛為籌備委員，籌備委員會由傅賢召集，並交行政院飭教育部負責進行。同月，中央第三二九次會議，加推吳敬恒、李煜瀛、褚民誼、楊虎城、王應榆、辛樹勳為籌備委員。二十二年八月，中央第三七一次會議，復加推邵力子為籌備委員。

戴傳賢等起草的《建設西北專門教育之初期計劃》

(參見戴季陶：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南京，1934)

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

《建設西北專門教育之初期計劃》案於1932年10月27日提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327次會議，決議原則通過，成立了“籌建建設西北專門教育委員會”。推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國民政府西京籌備委员会主任委員張繼、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朱家驊、國民政府監察院秘書長王陸一、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焦易堂、國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沈鵬飛為籌備委員。籌備委員會由戴傳賢召集，並交行政院飭教育部負責進行，同月，中央第三二九次會議，加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兼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國民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兼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陝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應榆、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審處處長辛樹勳為籌備委員。1933年8月，中央第三七一次會議復加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為委員，第三九三次會議復加推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為委員。



图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关于通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筹建委员会的批复文件 (1932.1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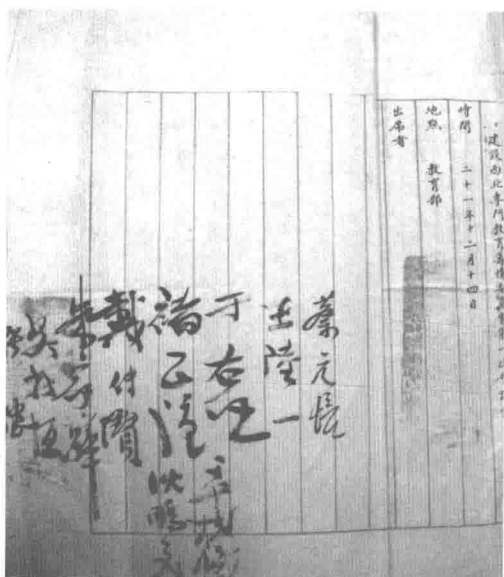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

1932年12月14日，“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公推于右任、张继、戴传贤三人为常务委员，并讨论了筹委会章程、办事细则、决定经费等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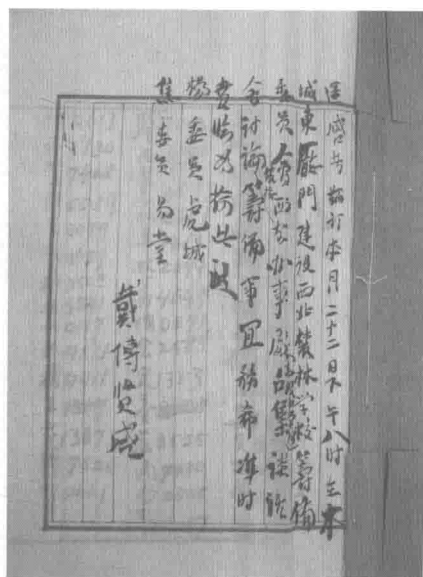
在“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同时，国民政府决定，将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归并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1933年1月开始择定校址，几经勘选择定武功张家岗为校址；7月于右任、张继、戴传贤三常委电聘王玉堂（字子元）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主任，在武功成立筹备处，开始筹办基建，着手成立农、林、园艺场，建立附设高级职业学校。1934年4月20日，在武功张家岗隆重举行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奠基典礼，同日农专学校大楼（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3号教学楼）奠基，宣告我国西北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正式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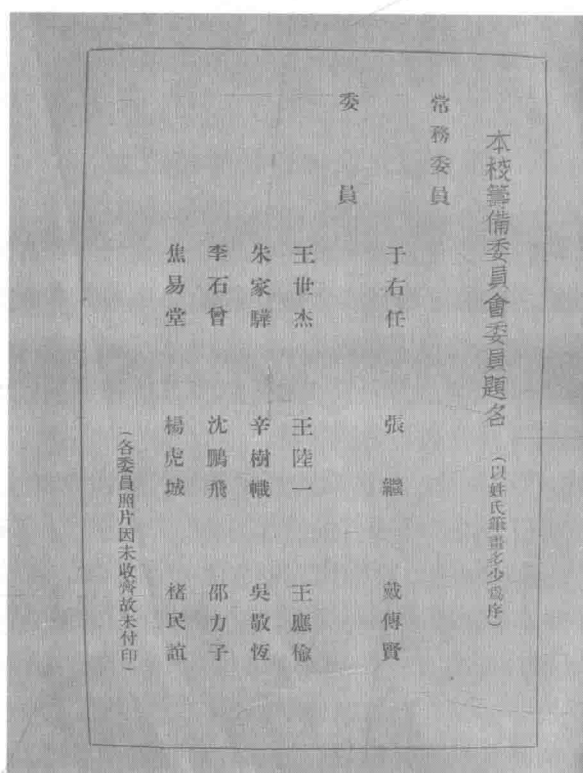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独立建校，成为近代我国西北高等农林教育的开端。



1932年12月14日，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参加建设西北专门教育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亲笔签名



1932年12月22日，设在西安东厅门的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召集谈话会，由戴传贤亲启邀请杨虎城等委员参加筹备会议的函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委会名单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委会常委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右任，陕西省三原县人，辛亥革命元老、著名书法家、爱国诗人和杰出的教育家。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省沧县人，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时任国民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戴传贤(1891—1949)，字季陶，四川广汉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委会委员



王世杰(1891—1981)，湖北省崇阳人，字雪艇，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任国民党中央教育、宣传、外交部长。

王陆一(1896—1943)，原名肇巽，又名天士，陕西三原人。1931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32年8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1935年，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民众训练部副部长；1941年调任监察使。

王应榆(1892—1982)，字庭材，号芬庭，广东南栅人，国民党陆军中将军衔。1933年，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任职半年辞职，投身筹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